

村莊精英行動的場域、組織、話語與記憶

——東南沿海栖霞村案例研究

◎ 蕭樓

一、精英理論的回顧與「精英行動——集體記憶」研究的理論建構

1、精英理論：研究回顧

在中國的鄉村進入民主化機制後不久，學者們就意識到，對村治的研究不得不面對一批在這一機制下產生的政治精英。他們的出現使得農村政治社會學研究開始在三個層面上同時對精英研究的「中國問題」進行探討。它們分別是，近代史中的精英權力機制與社會功能是怎樣的，同時隱含的問題是，鄉土社會中的精英政治一百年來到底有多少變化（張鳴，1997；王先明，1997；杜贊奇，1996，2003；程漱，2001）？在建構一個社會整體轉型理論體系時，農村精英的生存狀態與傳承機制和城市精英的區別是甚麼（魏昂德，2002；倪志偉，2002；孫力平，2002，2003）？農村政治精英在村治中的行動特徵與主要作用的判斷與評估（仝志輝，2000；賀雪峰、仝志輝，2002；蕭樓，1999，2001）。然而，這三個方面構成中國農村治理研究視野下的政治精英問題的內在聯繫是甚麼？對三個孤立研究如何構建一個整合的方案？這種整合的方案是如何在研究中具有較強的解釋力？

與前一方面相對應的是，理論應用上的尺度把握。這種理論自覺總是在農村政治的研究中被「東方」和「西方」話語力量的較量逼迫。西方對精英研究的文獻汗牛充棟，為中國農村精英政治研究提供了對話的平臺¹。但是這些理論研究的兩個主要的預設必須在中國的村治研究中被設為理論適用性的警覺——西方政治精英研究的都市社區取向，以及精英行動理論建構的憲政化背景。因為與西方憲政化背景不同，甚至比較強調鄉土性的中國精英政治研究，必須和西方社區精英和權力研究劃清界限，不然研究者難以逃脫自覺跳入西方政治現代化模式的窠臼而不自知。

在著眼於現代特徵的政治發展過程當中，對歷史的探討無疑是為了尋找現代農村政治的社會性資源，從而建構社會史的研究理路。但是，就其根本，這種研究的底蘊在於社會變革的深層，與民族國家宏觀歷史進程雙重被其關注。但是這種研究題材從晚清跨過民國一直延續到了現在，從士紳的作用與命運（吳晗、費孝通，1948；張仲禮，1991；王先明，1998；），到清末憲政改革、聯省自治中士紳²、商人的作用（侯宜傑，1993；西嶺，2002；劉軍寧，2002），到民國的鄉鎮建設與地主的分化（唐賢興，2001；李根蟠1998），一直到對十九世紀中前期關於農村生活的人類學著作的重新解讀（胡宗澤，1997），社區記憶對社區政治的影響（賀雪峰、仝志輝，2002），都表明精英研究的興起不是單純的檢視歷史，而是為現代鄉村政治研究提供借鑒。

社會轉型引發的思考來源於共產主義世界再十九世紀末的全球變化，東歐的研究被一部分學者轉向中

國，並引起了廣泛的爭鳴。正像魏昂德指出的那樣，雖然精英理論的基礎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再分配特徵，但該理論卻忽視了再分配得以產生的經濟制度（魏昂德，2002，載邊燕傑主編，2002：116）。對經濟轉型導致社會變遷是精英理論在經濟領域的反撥，從而使一部分研究在經濟發展和民主發展的經典命題上再次發生爭執（Jean C.Oi,1995；Kenvin J.O'Brien）³。不過，對經濟轉型的關注使城市與鄉村的雙重劇烈變遷的事實在農村研究中得到反映，但是，這些研究總體上是在西方社會公正價值觀的引導下，對轉型與分配機制導致的階層分化與流動的變化，特別是產生的新的再分配機制與導致新的不平等的思考（邊燕傑，2002：34）。它會使人聯想到，現在的城市——特別是小城是——就是農村的明天？

對與用精英理論研究現代農村——尤其是民主化介入以後的農村的，無疑最有反思價值了。農村精英對與社區政治的影響與影響方式是這些研究的重點。楊善華關注了宗族勢力在農村政治中的複醒（楊善華，2000），折曉葉描述了「超級村莊」中精英政治與鄉村經濟組織強盛之間的關係（折曉葉，1997），還有關注選舉過程中的精英作用與行動方式（仝志輝，2001），關注村莊政治走向中的政治傳統與「精英的系列」的構成（賀雪峰、仝志輝，2002）。

這些研究無疑是精英理論中國研究的思考基礎。然而，有更多的問題需要解決：精英政治是古已有之還是現代政治的產物？精英政治與現代民主的關係是隱含的題中要義無需討論還是相反？政治精英強化村莊政治傳統還是促進村莊政治與憲政理念接軌？

2、精英理論建構的三個維度：場域、話語與組織

費孝通早已對「鄉土社會」的政治做了經典的定義，在他那裏，政治是鄉土社會在沒有共同規範下尋求的「臨時解決辦法」（費孝通，1999：370）。當然，這種狀態是他所描述的社會的變化主要出現的是「社會繼替」，而不是大規模的「社會變遷」⁴，那麼處於社會變遷之中的精英的生存機制與政治效能到底是怎樣的？我們有這樣一些設想。

一是精英生存的場域是精英理論構建的基礎。「場域」是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創造的概念，一個場域由附著於某種權力（或資本）形式的各種位置間的一系列客觀歷史關係所構成，它包含各種隱而未發的力量和正在活動的力量的空間及其相互爭奪的行為（布迪厄、華康得，1998：17、139）。在於費孝通，鄉土社會的支配力量是文化性的，即使是在社會變革劇烈的時候，人們對社會變化惶惑、無所適從的時候，「時勢權力」⁵也只會創造「文化英雄」（費孝通，1999：380）。但是社會變遷的劇烈程度使「社區」生活在一個更為廣泛的關係網絡的支配之下，而「場域」引入的權力分析視角——並把它作為含蓋經濟、文學、科學、國家科層體制的「元場域」（華康得，1998：71）⁶——就與精英研究緊密結合了起來。

二是話語在精英理論構建中是關鍵的概念。語言的所指結構是受鄉土社會的共同價值與思維方式決定的，但是能指結構卻能夠在單音獨鳴的情況下招致反思，從而獲得認同。在傳統遮蔽的村落當中，精英的作用無疑是在傳統中找到合適的語境取得常理的支持。而當村落政治導入程式性的話語——如選舉制度——精英在創造新話語的能力就顯得更為重要了。

三是組織是場域關係性的集中體現。在場域視野裏，關係性是型構解釋框架的重要特性。農村中事件與生活的組合和一般意義上的組織是有較大差距的，但是精英的行動還是有其鮮明的組織性的。它在事件面前被場域的權力關係啟動，和激烈的變革性話語激蕩，又和村落原有的宗族、義氣、話語甚至氣氛所包圍。

3、雜額雜額記憶：歷史斷續的方式

如果運用「記憶」的概念而不加以說明，那麼，記憶就是歷史？社區分類以記憶為標識是否就是村莊的歷史（甚至地理）的因素不同？

實際上，我們認為記憶對於村莊性質的描述只有在特定的場域下才有意義，因為與場域相伴的慣習——一種積澱於個人身體內的一系列歷史的關係和能夠被觀察的知覺、評判、行動等身心圖式（華康得，1998：17）——才表現出來，於是生活經驗和政治精英、集體記憶和政治秩序、傳統言說和現代闡釋將把精英研究的現在和歷史聯繫起來，「記憶」才具有了學術概念的意義。因此我們就將精英行動和社會記憶整合為「精英行動-集體記憶」分析框架。

在栖村，主要的大姓是P姓，在他們的社區記憶當中，關於近100年前作為遭遇非常災變的外姓遷入的W姓的記憶是深刻的。W姓融入P姓社區後，他們象其他外姓一樣過著平靜的生活，直到新的事件將記憶重新啟動，並將歷史了斷了的文本重新書寫。我們正是在事件的引導下，洞悉整個權力場域——包括社區精英的記憶、話語、行動的。

二、精英活動的場域、話語與組織

1、精英競爭場域的格局

1999年開始，栖村由鄉鎮任命的「管理委員會」在上級的巨大壓力下，準備取消。這時，在中國北方實踐成果的「村民委員會制度」隨著「依法治國」的高層思路一路推進。浙東農村雖然在沒有執行村委會制度也沒有暴露出像北方一些農村類似的治理困境——因為高速發展的區域經濟已經將大部分社區矛盾消解了。不過村莊政治的活力仍然不夠，村莊政治組織隨著政治人物年齡的增加、體制外力量的成長和經濟因素的介入，已經逐步變成鄉鎮權力蔭庇下的傳聲筒。這一標誌是60多歲的PZR雖然還高坐在村莊政治的第一把交椅上，但是PSF實際上已經早已掌握村莊大權。由於權力缺乏有效的歸納，臺上的村莊政治精英已顯「疲態」，不時受到年輕一代的質疑。由於村管理委員的撤銷在1999年10月就已經宣佈，窺視村莊權力已久的一批相對年輕的政治精英，已經準備將潛藏的政治能量釋放出來。

我們在村莊生活的時候注意到村民已經在猜想這些人的動向。他們說：

「×××一定要選的！」

「×××、×××已經開始拉票了！」

「×××、×××有實力！」

「鄉鎮還是支持×××的！」

為了表述簡捷，我們將20名被視為參選物件的精英及其對有關人員的訪談列於下表：

姓名	基本情況	本人訪談情況	村民議論情況
PZR	原村支部書記	現在年輕人啊，亂來！	鎮上一定支持他！
PLS	原副書記	選舉可能要選亂掉的！	支委（村委）委可能還有得當。
PSF	原來支部委員	鄉鎮這一關不把的話，沒人幹事了！	勢力大羅！有權有勢。
PGL	原來支委、村副主任	我也不好說，現在變得太快了！	人還是蠻好的，兄弟也齊心。
PSB	原來支委、村主任	現在鎮裏有一些幹部是豆腐！	據說現在和鎮裏說不上話了…

PZS	原村委	身體不好，累！不參加了。	老班輩了…
PxY	原村委	還是選好，老百姓覺得公平一點。	房頭大，人也蠻好的。
WSW	原村委	不選舉，小姓永遠不會翻身	（我們vs據說W姓的）都支持他。
PXY	原來出外做生意	不搞民主，那些人的就把村子淘空了	可能要惹事了！…
PXS	村市場管理人員	我也去選一下，他們能當我也能當！	村裏情況他也是比較熟悉的。
PYQ	無業人員	那些貪官害死人。	不行！坐過牢的，唉…
PYX	無業	幾個兄弟都說去選，我也支持。	都是村裏混的人。
WLK	做小生意的	W姓也要有幾個人去選的！	頭腦活絡，不過打交道不多。
PHZ	出外做生意的	外面選舉早在搞了，參加就是機會嘛	據說賺了一些錢了！
PCH	務農	幾個兄弟都說叫我去選！	房頭人還是有不少的。
PYX	女	辦事處說要我也參加	據說辦事處交代有女的參加。

注：本表根據訪談筆錄整理，只包含訪談材料涉及的人員。

從整體上看，村莊中的政治精英分為兩個打的群體，一個是與鄉鎮結合緊密的原「任命村幹」，一部分是具有政治頭腦的精明的年輕人。他們中間，各有一部分人在市場化進程當中得到經濟利益，屬於「殷實之家」，但是在村民中的分化並不嚴重。在村莊政治引入現代的民主程序的初期階段，我們可以從兩個方向考慮——一部分是政治資源來源於政治體系內的「被賦性資源」，另一部分則是體制外聚積「自賦性資源」。當時，由於鄉鎮政權的政治控制權剛性較大，所以「自賦性資源」與「被賦性資源」的糾合還沒有開始。在這樣的理論進路下，我們可以對村莊的權力格局作大致呈塊狀的如下劃分：

		自賦性資源	
		強	弱
被賦性資源	強	A	B
	弱	C	D

由於A類型在當時還沒有明晰，D類型參與政治核心層面的可能性不大，實際上村莊政治就是B與C類的對壘。這樣以PZR、PSF為代表的B類與PXY、WSW之間形成了兩個較為明顯的競爭局面。

在PZR、PSF一邊，長期在體制內，熟悉與鄉鎮權力溝通的方法。PZR擔任支部書記多年，不但在鄉鎮幹部當中有深刻的烙印，而且，不少由縣、市、省級組織頒發的榮譽支援著他具有符號象徵意義的職位——儘管由於PSF的存在，村裏人都知道他已經大權旁落。而PSF則是體制內的實權人物，鎮土管所長兼村支委的位置使其成為聯繫政權組織與村莊末梢的正式通道。在PXY、WSW方面，PXY在上海其兄弟那裏管理工程好幾年，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同時積累了不少與方方面面打交道的能力。WSW比較特殊，他實際上是路東W姓的代表，由於P姓掌握栖村政治大局多年，有變局生成時，W姓倒是十分支持WSW出人頭地的。D鎮執行民主化決定的第一步就是推行村莊的選舉，從而使B類的政治精英倍感壓力。

2、選舉準備、清帳小組和社戲：弱記憶的強化

選舉準備工作在鄉鎮透出風聲的時候就開始了，在瞭解上級意圖上面，是「被賦性資源」的組成部分，換言之，PZR、PSF他們有足夠的渠道與鄉鎮溝通並獲得消息。而PXY、WSW一夥則在尋找政治城堡的縫隙。村莊裏面的輿論開始活躍了起來，他們不時的向各方傳播真的抑或假的消息。

在原來的政治格局中打入的第一個楔子的是D大廈的查賬問題，PXY、WSW把大量工程建設與後期商業運

行中的疑點寫成材料，向上級有關部門和領導分發郵寄。一部分材料批轉鄉鎮後，引起了對方的關注。於是他們讓鄉鎮出面作PXY、WSW的工作，並開始掩飾一些材料。這件事在村民當中促起了騷動，輿論越來越多的指向此時，並是一些原來對選舉競爭並不在意的人關注了起來。PXY、WSW於是提出要成立一個「清帳小組」，將過關帳目「洗清白」了。在選舉。這個條件是PZR他們不能接受的，也是鄉鎮不能接受的——這和鄉鎮為了完成法定工作而不出亂子的初衷不想符合。

「D大廈」事件在爭吵當中引起了媒體的注意，他們的插手使鄉鎮也感到棘手。時候看來，這是一個最差的解，因為一方面，「自賦性資源」強的一方在理論上有機會與政權組織溝通，而不必採取以「D大廈」事件這樣一個較為強烈的方式進入政治視野。但是資訊不對稱使得他們不知鄉鎮與另一方的關係多緊密，進入的門檻有多高。鄉鎮在瞭解這些人的能量後覺得他們可能不應被忽視，但這些人的行為是他們不能接受的，反過來給「被賦性資源」加上了一些籌碼。PZR、PSF他們在這個格局下獲得了鄉鎮的一些意外的支援，鄉鎮同意他們當權的村兩委在選舉前的立冬那天出錢演三天的戲。

演戲的目的雙方都是知道的，劇目的挑選也很有講究，第一場演的是《五女拜壽》，下面分別是《碧玉簪》和《江南女巡按》。前面兩場都是喜氣洋洋的戲，只不過PSF感到了讓百姓坐在一起話可能多了一些。確實，那兩天坐在一起的時候，大家對村裏的錢更關心了，據說有人在劇院門口問了PZR，惹得他那晚上沒去看戲。

戲演到最後一天，出事了。在PXY、WSW等人的策劃下，買通了戲班，篡改了《江南女巡按》戲文：

謝瑤環：你在建蘇州「×園」時拿走了多少銀子？！

蔡少炳：冤枉！

謝瑤環：冤枉？你看清楚了，帳目都在，還敢狡辯！

蔡少炳：啊…

謝瑤環：上次建蘇州衙門你搶佔百姓土地卻虛報工程款，說！自己拿走多少！

蔡少炳：征地後百姓都得到補償了呀…

謝瑤環：你把碼頭佔了，商人苦不堪言，侵吞了多少錢？

蔡少炳：碼頭都是別人佔的，哦…是武公子他們…

謝瑤環：你和武公子一起為殺人滅口，是怎樣害死張員外的？你以為這樣就沒人知曉了，就可以一手遮天了？！

蔡少炳：沒有，那武公子的事我不知道…

由於戲到最後關頭，PXY、WSW等在現場做了宣傳，百姓就傳開了，「古往今來，貪官都是這樣賺錢的，大家要警惕！」，「建×園和建D大廈、佔碼頭和佔停車場不是一樣的」、「PZY⁷死了，這帳也就沒法算了，你說這裏面…」。輿論的蒸騰導致了村莊政治不斷升溫，大家已經不再把視線投射到選舉上，而是更多的關注查賬。

戲班子最後在PXY、WSW那裏得到了足夠的錢，沒有與PZR、PSF過多的解釋就離開了。這場戲將PZR、PSF收買村民的設想化為泡影，戲文表現的間離效應與臉譜作用使得他們苦不堪言。村裏的查賬要求也愈加強烈，一周後，被PZR、PSF宣稱為「非法」的村清帳小組成立了。

在這個環節當中，由於解放後數十年形成的革命性話語，界說了政治合法性的組合邏輯，這個邏輯的關鍵在於話語的起點必須與官方——黨、政府、公社、領導、貧農等——認定的物象連接方可以起句。百姓絲毫沒有養成質疑的思維方式，不滿只不過通過「人民內部矛盾」話語被消解對立性。但

是，諧謔與諷刺畢竟是有效的，尤其是它和戲劇這種與百姓生活密切、理解深刻的話語方式結合在一起，臉譜化效應產生與奸佞同構的效果是一般的宣傳達不到的。村民弱化的平等意識與對於官員職位道德化要求再度被喚醒，當然這並不僅僅是戲劇展示的歷史，而是集體記憶中的一部分。PXY、WSW採取的方式，在形式上攪亂了PZR、PSF與村民交好和展示實力的意圖，在實質上點明了村政有腐敗存在的猜想——村民還是停留在這一階段的，更為深遠的是它表明PZR、PSF在控制村莊時已經不夠有力了，或許，這個發現被認為是致命的。

3、「拉票拉中間」和「拉票拉兩邊」

社戲過後4天就是選舉的日子，儘管拉票在此前就已經開始，但是由於看戲回來就晚了，活動的餘地並不大。戲一結束，大範圍的拉票就撒開來。

「拉票拉中間」是常理，是無數村莊都在進行的實踐的總結。它表示在競爭性選舉當中，爭取政治傾向不明顯的村民的支持是贏得選舉的關鍵。但是，在栖村，P姓之間競爭已經白熱化了，W姓的重要性就顯示了出來。因為，簡單區分誰是「中間派」的意義不大，P姓即便有中間票，比起整個W姓的票來說，只是少數，如果失去了W姓的票數，將意味著落選。因此，「拉票拉中間」在此時的戰略重要性遠遠不如「拉票拉兩邊」。

在W姓當中，WSW被視為是一個老實但講信用、能擔當責任的人。這樣的人在W姓當中勢必較有威信的。這與W姓的傳統有關。100多年前，P姓在未改姓之前在河南岸的J鎮（後來升格為J市，現在是J區），原姓氏為Y姓，只是在一次教案衝突中，幾乎被滅族，當時的P姓大族的一位族長尚義，許其入村居住，於是改姓為W，以待歲時湮沒歷史。

關於這段故事，村莊中的老人是這樣描述的：

天主教主LSC，慫恿百姓忘祖宗；
不許供奉君親牌，不許祭祖先父母；
貧窮者誘其以資，羸弱者誘其以勢，犯法者利其逃捕；
「徹天紅樓」阮釗賢，流氓坐堂管小本，欺壓寡婦佔良田；
BX怒挖小本眼，捕房設下鴻門宴；
BX雖然做歹事，實際捉拿不應該；
一來本是同鄉裏；二來又是祖婆親；…
BX本是小羅羅，（Y）WD才是頂天汗；
統領幾千廟香會，一路殺洋人燒教堂；
統帶軍令吹洋號，官兵求生無人效；
WD蕩縣劈監牢，兵勇屍體浮泡泡；…
事後出走太平縣，告密引來保長陷；
WL本是WD第，為兄早在牢中泣；
兄弟被殺江船上，WD留下絕命書；
我本會道宮裏人，為天主教喪斯生，
群奸預擬莫須有，千古奇怨幾個伸！

長期在W姓與P姓流傳的是W姓祖先兩兄弟為民權抗擊洋人與滿人，後雙雙被殺。以致族人均被牽連，遷居J江北。W姓數家遷居江北的栖村以後，與原來留下的Y姓聯繫減少，後由於江南Y姓也數次變換居住地——儘管搬得並不遠，甚至中斷了聯繫。

所以WSW的參選，實際上代表極為懵懂的恢復祖上「拳勇」風格的嘗試。W姓的村民有這樣的議論，「他的高祖就是領頭的，他也有這樣的能耐…」，「W姓人不想和人爭，現在有政策了，當頭我們當不了？」，「當年一個縣也打下來了，村裏的官…也當得！」

在這樣的氣氛下，PXY、WSW的聯手，集中了W姓大部分票數——當然W姓不是鐵板一塊，有不少與老班子關係緊密的人——集中了起來。在W族當中，幾乎都有一個共同的記憶，那就是W姓祖上有兩兄弟是真正的英雄。W姓人的參選，似乎是重現了先民的豪氣，爭取到了小姓在大村中間的容光。

於是，「拉票拉中間」在栖村的選舉當中已經不是拉的問題，而是競選的組合問題。沒有W姓參加的組合勢必落於劣勢。選舉後，PZR、PSF他們意識到了這個局面出現的原因。

4、英雄故事的篡改：強記憶的弱化

29日是選舉日，頭一天晚上，根據村民的回憶，兩邊的拉票已經白熱化了。數十個小組在村莊當中流竄，其中有不少的幕後交易。但是最令人吃驚的事情發生在那天晚上11點多鐘時，W姓候選人WSW因為搓麻將「涉嫌賭博」被員警抓走。第二天，選舉前說是PXY找了村鎮幹部說項，WSW被放了出來，仍然能參加選舉。時候的訪談中PXY、WSW認為對手要耍權術，準備不讓WSW參加選舉了，但是不敢得罪大多數，又放了他。選舉的結果是出人意外的，第一輪投票沒有一個人得票超過半數，第二輪也只有PXY一人當選為村委會委員，其他人都落選了。

在本節我們不再就選舉的具體問題作分析（詳細參見下一章）。但是選舉後輿論的發展方向卻令人思索。

首先是關於WSW的個人品德問題，由於被員警抓過一次，村裏開始傳言他有劣跡，甚麼賭博輸過多少錢啊，在哪里嫖娼被抓過啊，甚至欠人家多少錢沒有還，等到村裏撈一把等等，不一而足。

致命的是，W姓改姓之前的一些事，有關於Y氏的傳言多了起來。由於WSW是130年前被殺的YWD兄弟的直系子孫，那些傳聞使得一部分村民和他的關係鬆懈了下來。這些傳聞歸納起來有：

首先是關於YWD的出身，村裏開始傳聞是當地的混的，後來加入了香會，每天持一柱香，求神拜佛，和現在的「法輪功」差不多。

其次是關於YWD的作用，說《拳禍記》裏面說道W縣的J鎮燒天主教堂，並沒有YWD的名字，至於後來與教會的衝突是香會和教會的矛盾，不是打抱不平。

關於YWD的死，說他到官府衙門的時候就喊著求饒了，他還要為他弟弟的死負責，因為YWL是他誘來的。

最難受的是關於兩人死後，子女的去向，說YWL的兒子後來入了天主教，幫助作惡，曾經被官府羈押在杭州牢內3年多，回鄉後被鄉黨詬嗎，過活不下，才跑到屬於灶戶的江北混口飯吃，日後為了隱瞞事實改了姓；而YWD的女兒則「為了避免滅族」，嫁給了有勢力的天主教徒RZC。

這樣的傳聞，給了WSW巨大的傷害，他曾經有一次去責問傳言的人，據說打起架來，但是沒有人知道這樣的消息是從甚麼渠道開始流傳的。

這些傳言是一次「英雄」祖上認同的解構，是將WSW作為YWD傳人的相似性，如：英勇、敢作敢當、有

極強的組織才能、有與命運抗爭的經歷、上天有負於這樣的人等等，全部化為泡影。同時，YWD的另一一些有關於他的劣跡的傳言，作為解構的對面被加強了，當然也包括他參加競選的個人目的。

W姓村民的日常態度，尤其是面對這些傳言的時候，是激烈抵制的，但是作為一種策略，村民都避開了作為WSW作為其代表的意味。一些人開始在閒談時候表示，自己的祖上是WSW的親戚，其實沒參加甚麼暴動，只是事後遭到牽連。一些人在講話的時候，言辭竟有了一些埋怨，好像WSW祖上若是有這樣的事是往家族臉上抹黑。

5、清帳小組：組織的力量

村委會選舉後的班子是零落的，可以用殘缺不全來形容（王小軍、蕭樓，1999）。選舉以後的班子情況讓D鎮的領導和辦事處的頭頭很惱火，他們說「村官誰當是一回事，但是沒有核心人物難辦，我們有事找誰」，「找誰辦事就招誰！」，「兩邊不討好」。在這樣的局面下，幾乎難以開展工作。但是兩邊——如果有的話，甚至任何一邊——都不願意讓這樣的局面繼續下去。在這樣的局面下找一個平衡的方案是不可能的，必須有一方崛起進而達到突破。

於是，原先被宣稱「不合法」的「清帳小組」被作為一個突破口，由「一個人唱戲」的唯一村委PXY推了出來。

選舉後的第一次村民代表大會的議題被PXY、WSW定為重新賦予「栖村清帳小組」以權力，而且宣佈，在查清原來的帳目之前，本次村民大會發的每人15元的誤工補貼「由現任村委領導墊付」。

PZR、PSF的一方做了阻止的努力，他們先是要求一部分人不要參加村民大會，後來動員鄉鎮出面阻止。於是鄉鎮下發通知，要求在預備召開村民大會的一天所有村兩委主要負責人到鎮裏開會學習，不得請假。

但是，在日期推遲兩次後，村民大會還是開了起來。經過投票，同意成立「栖村清帳小組」，機構獨立於村委會和黨支部，凡是涉及1997年以後的栖村帳目，均在清查之列。並決定第一次清查從D大廈建設開發上開始。

栖村「清帳小組」成員表

姓名	職務	個人資訊
PXY	組長	村民委委員
PYQ	副組長	村中有勢力者
WSW	成員（負責調查核實）	村民小組組長
PXJ	成員（負責梳理帳目）	臨時的文書
PDT	成員	村民小組長

清帳小組作為正式授權的組織建立以後，原來的村委會將帳目藏了起來，並繼續宣稱「清帳小組」不合法。於是，原來兩個選舉對壘的小組，PXY、WSW一組變成是追兵，另一組是逃兵，逃兵的一組要面臨更多群眾的詰難。這時，對於W姓來說，關於族中先人的議論已經告一個段落，現在主要的是看到了村中年輕人怎樣把帳查清楚。

鄉鎮介入了紛亂的查賬行動的調解，他們要求將帳目交到鄉鎮，然後再交有關部門進行審計。因為在村兩派正式形成的時候，他們覺得前任的帳目清查，要在村莊中解決都是十分困難的，即便查出東

西，另一方也會覺得不公平。

此時，作為組織的「查賬小組」的功能卻發揮出來了，開會以此命名，村民委反正是光杆司令，索性這些人就履行村委會的職責了。他們刻意不再以「派」的名義活動，拉攏了一些原來瓜葛不多的人，竟慢慢地將一些懷疑的目光引開了。

當然，查賬引發的爭執此時當然沒有平息，因為這取決於那些帳目的審計結果，不過誰又能料到這帳一審就是兩年多，也就到了新一輪村委會選舉的時候了。但是換一種思路看，作為新的「自致性資源」型精英的崛起，肯定會受到各種因素制約的，原來政治精英的能量還沒有釋放完畢，這個政治場域怎麼可能少了他們？但是在這個政治場域當中，精英的更替已經存在並已經凸現出來了。

在一個現代民主程序下產生的一個並不規範的機構，對於村莊當中激烈的話語爭論和歷史記憶的競爭，起到了明顯的解構作用。我們發現，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鄉鎮介入村莊事務的方式是溫和的，村莊內部的競爭，歷史記憶的喚醒和集體——宗族？派性？——關係的動員是資源的挖掘主要方向。不過，在這些資源當中，歷史記憶是有政治正義功能的。它在現代程式正義的衝擊下，不斷的在其外部發生嬗變，以至於多次進行著話語言說的相互逼迫。不過「有規劃的社會變遷」是漸進的，W姓關於祖先的集體記憶在事件風潮過後又會恢復到原來的形態。

三、討論

不少社會記憶理論運用在精英研究的時候，它的初始功能就是為精英研究奠定分類的標準。或許，社會記憶本身就是村莊性質的構成要件。然而，對村莊性質研究只「回到費孝通先生所研究的傳統社會基本性質上」，對現代轉型的關注缺少理論構造，「偏重於變遷原因的因果解釋模型的構造」，往往被學者詬病（徐曉軍，2003）⁸。精英研究的內在理路就規定了對個體的重視程度和口述史方法的運用一起構成了這一理論對國家歷史宏大敘事（master-narrative）支配下的社區記憶的重構（reconstruction）。在精英政治資源構成的若干要素當中，我們關心了「自致性資源」當中的群體記憶的作用，不但是結構性的，更為重要的是在動態建構時的呈現。

當然，精英理論研究的不止是社會記憶對精英產生、活動的影響，換言之，集體記憶對精英作用研究不是精英研究的全部內容。可是，為甚麼在研究精英的時候我們如此關注集體記憶？實際上，這與我們在引入政治民主程序時社會環境與西方式的政治程式產生的環境截然不同有關。我們希望在本土環境中理解政治程式與鄉土規範是如何共同作用的。這時，精英包涵的意義不再是憲政程式下，社區力量較量的載體，而是在社會變遷過程中，兩種準則——現代政治的和傳統文化的——在政治人物（尤其是被視為精英的）行為中的選擇。

實際上，這樣的研究又產生了兩種類型，一種是直接將西方民主理論與中國農村治理結合起來，將民主研究與精英研究結合起來。要「描述西方精英主義民主理論的發展與其主要思想，從中發掘出對中國民主化有所啟迪的思想資源」（郎有興，2002b），「民主政治的有關產品（如制度、法律、程式、民主化的策略等）是由政治精英供給的，這些產品是他們製作的」（郎有興，2002a）。但是，郎關注的是「精英」指的是各級民主政治的推動者，或者說大部分所包含的範疇是各級官員。在理論層面，對官員的研究使得民主與中國政治的對接顯得並不生硬，不過官方推動的鄉村民主研究的主體還是在農村，村莊精英的研究不是僅僅表現在「網路」這樣一個辭彙上的。另一種類型就是轉入了村莊性質的研究，把集體記憶作為村莊性質構造的一個維度，從而在分析村治精英的類型。一般來說，按照帕雷托開創的「治理精英」和「非治理精英」的區分與社區記憶程度、經濟分化程度構成幾組「理想類型」進行研究。這樣精英行為就因為結構化的解釋模式的建造而被排斥在外了，整個理論分析在自己

建造的「結構」裏面進行，實際上是將村莊集體記憶問題概念化以後拋棄，不再做任何分析。

因此，我們對於精英理論構建就是回到「精英行動-集體記憶」的視角下來。費孝通對於傳統社會的理解包含三個層次，一個是生活，這是社區人群的「目的」；一個是「位育」，也就是生活的「手段」；最後就是文化，「是位元育的設備和工具」（費孝通，1999/1946：301），同時「觀念是文化中不能分的一部分；是一種幫助社會位育處境的力量」（同上：304）。實際上儘管費強調，在「鄉土社會，當它的社會結構能夠答復人們的生活需要時，…，因之它也是個很少」英雄「和」領袖「的社會」（費孝通，1999a：380），但是當社會變遷速度加快時，精英的作用就構成了社區研究的重要部分。費在強調鄉土社會研究「靜止」的同時非常強調「位育」、「觀念」行動的部分，因此，建構「精英行動-集體記憶」的首要任務就是將「記憶」與原來的研究概念「歷史」、「位育」、「觀念」、「習慣」等等相區分。按照王明珂的研究，「社會意義的記憶」可以分為三大類型，「社會記憶」、「歷史記憶」、「集體記憶」。社會記憶的範圍較大，歷史記憶強調在群體和次群體之間的流傳，而集體記憶則強調小群體的專屬性（王明珂，2001）。

首先是記憶內容中呈現的母體。栖村W姓集體作為一個外姓在P姓佔大多數的村落裏生活時，建立了一個屬於自己的記憶母體。這個記憶母體裏主要包含兩個重要的內容：一是為甚麼W姓的人群回生活在P姓聚集地？是因為一次幾乎滅族的經歷。二是在一個處於外姓主導的社會中如何維持本姓的尊嚴並保持與P姓的平衡？那就是W姓改姓之前的Y姓是典型的罹難「英雄」，而栖村P姓的祖先救這樣的外族人也是壯舉。這個傳說母體包含了P、W兩姓的共同記憶原型，並且多年未有疑問。而精英行為得到支援的基礎，正是精英行為先驗地被設定為帶有「群體認同」的意味，其成敗得失牽動較為強烈的「共同信念」（the common belief of origins）⁹。由於P、W兩姓是共用這一母體的，所以從屬性來說，這個母體是一種「歷史記憶」。在精英行動當中，歷史記憶的結構是單一姓氏創造的，那麼將為精英行動提供持續的支援，直到這個記憶被社會發展抹平；但是如果歷史記憶是複雜的，則有可能析分為兩個集體記憶。實際上，在記憶競爭當中，W姓的先祖的歷史被P姓精英行動重新解釋後，面臨集體記憶的變更。

其次是精英行動與集體記憶互動方式。精英行動時，現實的政治安排——如嵌入鄉村社會的選舉制度——會由於國家力量的強大而不能拒絕，實際上是不可能有力量的抑或這樣的懷疑傳統來拒絕。因而集體記憶當中可以被精英操作的其實是接納的方式。選舉制度本身提供給政治精英操作的空間是技術性的——關於這一點下一個章節將會詳細論述——而對鄉土資源的運用確實基礎性的，集體記憶在選舉過程中的運用代表了精英行動能力的提高和社會變遷程度的提高。在栖村社戲期間，PXY、WSW將現實存在的「腐敗問題」——當然這是在查清之前的臨時稱呼——通過篡改戲詞的方式進行表達和傳播，實質是用社會記憶激發村民的聯想，將社會記憶當中的奸佞形象與PZR、PSF等人結合起來，從而將人臉譜話。社會記憶的運用使得集中在傳統當中的象徵資源被利用起來，對一方造成文化「逼迫」。這種現象雖然會被百姓遺忘掉一些，不過短期的效用是比較大的。PZR方的反擊也顯示了操作歷史記憶的強大作用，WSW在偶然的賭博事件當中被羈押一晚，但是攻擊歷史記憶的縫隙就由此而起。對W姓歷史的重新解釋，無論所用的材料是否官方——確切的說是經過精心準備的——招致的是W姓不少村民在解釋上的屈服（當然有反擊的，但是從訪談的口述材料看，反擊話語缺乏應對攻擊的「能力」）。集體記憶的消解在村民那裏是災難性的，不少村民不願意談及此時。因此，主動忘卻將會被集體啟用，經過若干年後，將此事忘卻。

精英活動導致的記憶變化對於村民來說是驚心動魄的，即便記憶的主動忘卻能力是這種痛苦可以減少到最低限度。精英們實際上傾向於利用國家植入的現代政治制度來進行競爭，只是這項制度植入之初，特別是憑藉「自賦性資源」的精英對於政治設柵¹⁰的高低並不瞭解，所以採取了這樣的競爭策

略。同樣憑藉」被賦性資源「精英更不想這樣出招，因為他們多年與政治組織建立的溝通網路與聯繫方法和現代政治制度更加接近。所以在一段時間以後，雙方的策略都將調整。不過」精英行動-集體記憶「不會在精英競爭當中消失，它將轉換為另一種更加直白的、」去隱寓「性的方式——派性。此時，雙方不再攻擊兩姓相似文化的核心部分，只是人際網路、親情、面子和金錢等因素在精英權力場域中會更加引人注目。而退後到較遠的時空方位去觀察時，部分與現代程式有關的政治事件，如「D大廈」的事，就開始進入村民的歷史記憶。

難道這就是政治轉型推動社會觀念變革的徵兆？

參考文獻

仝志輝：〈村政精英的艱難替代——江西艾村村委會選舉觀察〉，2000，www.chinaelections.org。

仝志輝：〈精英動員與競爭性選舉〉，《開放時代》2001年9月號。

賀雪峰：〈村莊精英與社區記憶：理解村莊性質的二維框架〉，《社會科學輯刊》，2000年的四期。

賀雪峰、仝志輝：〈村莊權力結構的三層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1期。

張鳴：《鄉土心路八十年》（上海：三聯書店，1997）。

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杜贊奇：《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王先明：《近代紳士——一個封建階層的歷史命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鄧正來主編：《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

劉北成、許虹編譯，張家銘校閱：《精英的興衰》（臺灣：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社，1993）。

莫斯卡：《統治階級》（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

蜜雪兒斯：《寡頭統治鐵率》（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倪志偉：〈國家社會主義由再分配到市場〉，載邊燕傑主編，《市場轉型與社會分層》（北京：三聯書店，2002）。

魏昂德：〈再分配經濟中的產權與社會分層〉同前書。

王先明：〈近代士紳階層的分化與基層政權的蛻化〉，載《浙江社會科學》1998年第4期。

張仲禮：《中國紳士——關於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的作用》（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

侯宜傑：《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政治改革風潮：清末立憲運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西嶺：〈聯邦模式與清末變局〉，2002，www.china1840-1949.com。

劉軍寧：〈聯省自治：二十世紀的聯邦主義嘗試〉，《戰略與管理》，2002年第5期。

唐賢興：〈1927—1937的南京國民政府：國家整合的失敗與現代化計畫的受挫〉，《江蘇社會科學》2001年第4期。

李根蟠：〈關於地主制經濟發展機制和歷史作用的思考〉，《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3期。

胡宗澤：〈華北地方權利的變遷——1937—1948年十裏店資料的再分析〉，載王斯福、王銘銘主編：《鄉土社會的秩序、公正與權威》（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

- 孫力平：〈總體性資本與轉型期精英形成〉，《浙江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
- 蕭樓：〈互構村莊——權力轉換機制和村莊治理結構〉，《開放時代》2001年第3期。
- 郎有興：〈民主政治的塑造：政治精英與中國鄉村民主〉，《浙江學刊》2002年第2期。
- 郎有興：〈精英與民主：西方精英主義民主理論述評〉，2002，www.chinaelections.org。
- 程漱：〈社區精英的聯合和行動〉，《歷史研究》2001年第1期。
- 楊善華：〈家族政治與農村基層政治精英的選拔、角色定位和精英更替〉，《社會學研究》2000年第3期。
- 折曉葉：《村莊的再造》（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 章開沅、馬敏、朱英主編：《中國近代史上的官紳商學》（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 馬敏：〈紳商「詞義及其內涵的幾點討論」〉，《歷史研究》2001年第2期。
- 費孝通：《費孝通文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 徐曉軍：〈轉型期中國鄉村社區記憶的變遷〉，2003，www.chinaelections.org。
- 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歷史研究》2001年第5期。
- 李英華：〈中國經濟改革的發展〉，載胡耀蘇、陸學藝主編，《中國經濟改革與社會結構調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 Eva Etzioni-Halevy ed, 1997, *Classes and elites in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a collection of readings*, New York: Garland.
- Harold D. Lasswell Daniel Lerner and C. Easton Rothwell, 1952,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lites: an introduction and bibliograph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useppe Di Palma, 1990, *To craft democracies: an essay on democratic transi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obert A. Dahl, 1989,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Tom Bottomore, 1993, *Elites and society*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 J.O'Brien, 1999, *Hunting For Political Change*, The China Journal, NO.41, January.
- Shi Tianjian, 1999, Village Committee Elections in China: Institutional Tactics for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April, p.385-412.
- Jean C.Oi, 1995, 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China Quarterly*, No144:1132-1149.
- Lewis A.Coser, 1992, Introduction: Maurice Halbwachs, in *On Collective Memory*, ed. & trans. by Lewis A. Cos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註釋

- 1 在「古典政治分析」視角下，精英理論(elitism)是作為作為一種解讀政治和歷史的理論與方法被廣泛討

論的 (Etzioni-Halevy, 1997)，它的核心內容是認為社會總是處在少數人的統治之下，這些佔社會統治地位的少數人即稱為「精英」(elite)，他們在社會中起決定性作用並把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1992：233) 精英理論的淵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臘時期，「自從柏拉圖寫作《對話錄》以來，一直縈繞在鑽研政治問題的人的頭腦的另一個思想是「至善者」(the best people) 應當統治國家 (莫斯卡，2002，轉引自劉北成、許虹編譯，1993：89)，但是從義大利的政治理論家莫斯卡 (Mosca) 創作《統治階級》一書開始，精英理論才作為一種政治思想史上的理論流派正式出現。不過真正提出精英概念並使之廣泛傳播的是義大利的另一位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帕累托 (Vilfredo Pareto)。在米爾斯那裏，精英的統治被絕對化為「寡頭統治鐵率」，宣稱「大眾直接民主無論在機制上還是在技術上都是不可能的」，現代組織的不斷發展「是寡頭統治的溫床」(蜜雪兒斯，2003：19、28)。實際上，關於「精英」問題的討論——當然從時間上Etzioni-Halevy 把現代精英分析劃分為「民主與民主化中的精英：新分析」和「民主的階級理論與精英理論的趨同」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更為重要的是其實質性的爭論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不可避免的精英政治到底在何種歷史條件下與民主達成互動關係；二是，民眾到底在精英政治當中扮演什麼角色；三是，是現代政治模式導致精英的產生還是精英活動創造了現代政治。從而，現代政治的發展到底最終導致精英政治與現代民主整體的相互加強？(這些討論詳細可以參見Harold D. Lasswell, Daniel Lerner and C. Easton Rothwell, 1952; Robert A. Dahl, 1989; Giuseppe Di Palma, 1990; Tom Bottomore, 1993; 國內的可以參見郎有興，2002b)。

- 2 有關士紳、紳商及其有關他們作用的研究可以參見余英時，1987；章開沅、馬敏、朱英，2000；馬敏，2001等。
- 3 關於這些評論可以參見蕭樓，2001；郎有興，2002。
- 4 關於「社會繼替」和「社會變遷」詳細可以參見費孝通，1999：vo15：379。
- 5 在費孝通那裏，權力分為四大種類，分別為「橫暴權力」、「同意權力」、「長老權力」和「時勢權力」(費孝通，1999：vo15pp378—380)。
- 6 布迪厄、華康得，1999：71，原注32。
- 7 前任村管理委員會主任，再一次車禍中死亡，系PSF的親戚。
- 8 徐曉軍認為，在當前的農村問題研究中，一個明顯的特徵就是頻繁引用費孝通先生《鄉土中國》一書中的概念，這體現出當前這些研究的基礎仍停留在費先生所言的轉型前的傳統社會上。他認為，中國鄉村社區記憶研究的兩條不同的路徑——一條就是以西方漢學人類學家弗裏德曼 (Maurice Freedman) 為代表的西方學者的研究；第二條路徑就是試圖從本土的發掘來發現中國鄉村社區記憶的特點 (徐曉軍，2003)。不過社會記憶的中國研究顯然不僅僅是這兩個路徑，詳細可以參見晉軍，1995，1998；方慧蓉，2001有關綜述。
- 9 在Maurice Halbwachs那裏，即便是「個人」的記憶也是集體的社會行為。社會組織——如家庭、國家、民族、家族——都在一種相應的集體記憶 (collection memory) 中得以凝聚，較大的組織，如國家會組織集體性的紀念活動，這就是一種集體記憶的強化作用，宗族活動也是如此 (Maurice Halbwachs, 1952, 轉引自Lewis A. Coser, 1992)。
- 10 這裏是借用大衛斯的名詞，我指的是政權和強大的政治組織對於從事政治行動的精英設定一定的規範要求，防止不符合與其政治系統對接的人進來。這和大衛斯表示的是傳統政治、文化力量防禦現代政治、經濟、商貿滲透的防線有所不同，大衛斯的理論可參見李英華，2000。